

布

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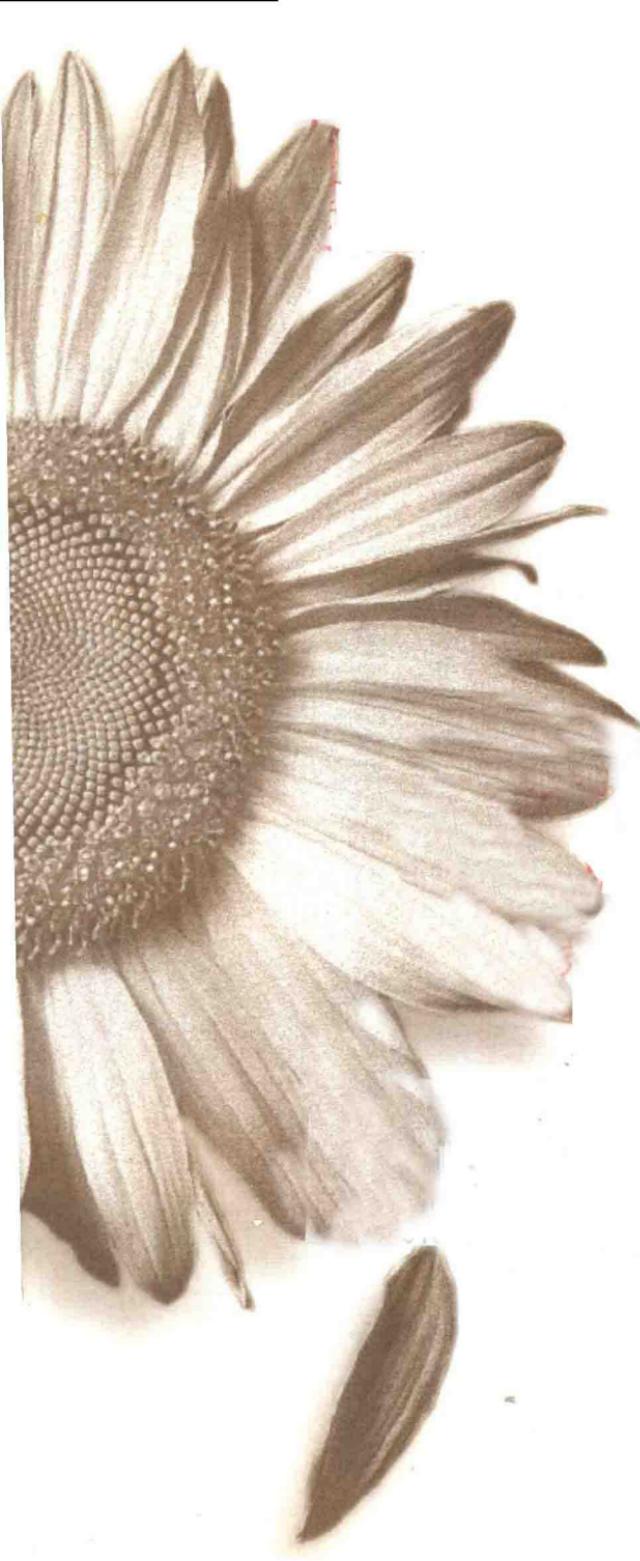
司徒伟智

上海人民出版社

闲

话





席衣

司徒伟智
上海人民出版社

闲话

责任编辑 董逸伟
罗 湘
封面装帧 王建纲

布衣闲话

司徒伟智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54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092 1/32 印张 8.25 插页 2 字数 177,000

1998年 2月第1版 1998年 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7—208—02641—6/G · 401

定价 12.50 元

前　　言

在家里，孩子碰上数理化难题，是不会来问我的，因为他
说“爸爸是写文章的料”。

每回听说，我总是哑然失笑。想当初，我在高小刚刚开始作
文，也就是所谓“发蒙”的那一段，所有功课中就数作文差。其
他都拿5分，作文老是4分、3分。一着急，就在课余时间自拟
题目，一篇篇地写。好在我碰上了个好老师，叫顾慧清。她只
有一个女儿，远在大西南搞地质，却视我们这班毛孩子为儿女
了。她特别欣赏我的用功，对我交上去的不像样的“作品”必认
真批改，从主题到结构到文字，哪儿都不放过。直到小学毕业，
离校那天她还专门递给我一张字条，鼓励我“继续努力，将来
一定会成可造之材”。——这给予我多大的自信啊。

我就这样改变了自己。也许改变得太厉害了吧？如今天
南海北、四面八方报刊来信的，每个季度甚至每个月有几封，
竟都嘱我“赐下杂文”。也就是说，在人们眼里，我真成了块“写
文章的料”。

谁说“本性难移”？人多么容易改变啊。16年前采访苏步
青老先生，听他谈及在浙江乡下读小学，开初数学考试成绩是
全班倒数第一。我就深深感慨于这一点。如今，轮到感慨自己

了呢。

只是，改变是一个永不停息的前进过程。要前进，又时时需要停下来总结、研究。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从十余年的杂文作品中精选出 91 篇，按照不同内容予以编排（其中一部分作品当初发表时用的是笔名“马布衣”、“闻纪之”）。很遗憾，顾老师已经不在了，她不再能给我圈圈点点加批语了。好在我现在的作文一概公之于众，这等于又拥有了无数个老师，他们全会对我评头论足。

还像 30 余年前那样，我这“笨学生”交出了这一厚叠卷子，等待着老师的批语。当然，我还像当年一样，最关心的是评分——“老师，这次我可以打几分呢？”

但愿是 5 分，也许只有 4 分，或者竟是 3 分……不管怎样，我希望能得到来自读者也就是老师的直率的回音。

作者

1996 年 10 月 8 日

目 录

前言 1

不拒绝思辨

来自佛罗伦萨的玩笑	[3]
第五个烧饼	[6]
太实惠	[8]
同是碳原子	[11]
母子篇(二题)	[13]
“戏外戏”的症结	[15]
少一点大惊小怪	[17]
还是“老框框”作怪	[19]
“叔叔”无愧	[21]
勇士的观念	[23]
纪晓岚说得对	[25]
“现管”何在	[28]
“非正规”辨	[30]
起名的哲学	[33]
正是说话的时候	[35]
可怕的“倾覆”	[38]

那么,我呢?	[41]
数字的“捶打”	[44]

教养真难

如果成不了才	[49]
读两首爱情诗	[52]
论长生不死	[56]
迟到的“孝敬”	[59]
不妨大笑而特笑	[61]
来一番“壮胆”教育	[63]
学会“尊重”	[66]
不如怨自己	[69]
正因为是学者	[72]
告别“杰茜现象”	[75]
传言宜作“耳边风”	[78]
就怕人家说话啰嗦	[81]
即使夜深人静时	[83]
世界容得下你我他	[86]
“小偷”不是放走的	[89]
我也禁不住要鼓掌	[91]
要悔且待青山烂	[94]

学问即人生

量化就怕简单化	[99]
说不过去	[102]

上海植物园所见	[105]
悲哀岂仅“一只眼”	[108]
招牌倒不是最要紧的	[110]
过于“精确”的意见	[112]
不算吃亏	[115]
缺少喝彩的成功	[118]
少见多怪	[121]
“体统”正解	[124]
再投李存葆一票	[127]
唯有识者能重才	[130]
别有深意在其间	[133]
贝多芬在“劳动”	[135]
“定向培养”应该缓行	[137]
“差不多先生”再生记	[139]
深度	[141]
虚名儿	[144]

立足今天

最后的棚户	[149]
“减路增店”存疑	[152]
“管闲事”的科学定位	[155]
龟兔赛跑的另一种结局	[158]
我们需要创造	[161]
正是为了保护人	[163]
原来是“压阵”的	[166]
“写端正”为先	[1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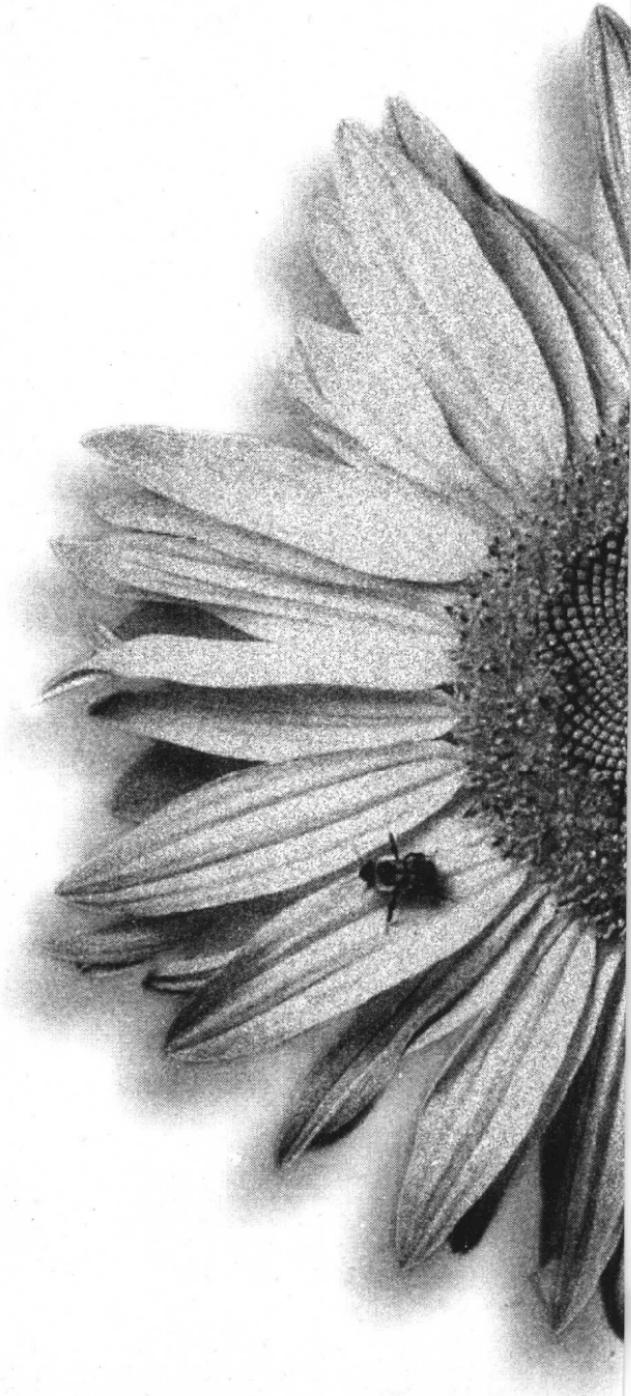
梭鱼水中歌	[171]
“介绍信”之研究	[173]
到耻为止	[175]
划一条界线再说	[177]
舆论监督无级别	[180]
但愿这不是梦	[183]
救救自己	[185]
“一块牌子主义”	[187]
部长“难产”	[190]
谨防“自说自话”	[192]
瞧,那个遥远的邻居	[195]
外婆的年龄	[198]

熟悉或陌生的

刮目看英雄	[203]
钟楚红向谁求援	[206]
报人事业	[208]
不学有术	[211]
左宗棠留下的笑话	[214]
谈“知人论世”	[217]
不做生活的旁观者	[221]
陈其才的三条回答	[224]
登错了地方	[227]
郑板桥爱鸟之道	[229]
李泌论“官”与“爵”	[231]
服老和不服老	[234]

卷子与条子	[236]
别拿历史开玩笑	[239]
两个好孩子	[241]
太炎先生又一事	[243]
刘易斯的遗憾	[246]
为一个好人作传	[249]

布衣闲话
不拒绝
思辩



来自佛罗伦萨的玩笑

佛罗伦萨，很早就从欧洲小说中熟悉它了。在我的想象中，这座聚集过但丁、米开朗琪罗这般伟人的艺术之城，一定是美不胜收的。

巧了，“不必说老式有轨电车丁零零慢悠悠地从身边晃过，不必说造型独特的 94 米威克乔奥宫直指蓝天，也不必说遍城的雕塑，单是那座金桥，就令人心驰神荡”——杨潇女士的《域外随笔》(见《四川文学》)用简洁的笔墨，正画出了我心目中佛罗伦萨古雅而富足的图案。

只是我实在料不到，一个中国旅游者在这里一饱眼福之余，会承受如此大的心理压力。

原来，就像我们上海的新客站广场、十六铺码头的情形一样，佛罗伦萨火车站也活跃着“旅馆掮客”。你看，杨潇一下火车，就碰上了——“不少意大利老人围过来，抢着塞给我们旅馆介绍，同时口中叫着：‘Japan! Japan!’(日本! 日本!)我一面按着我的箱子，一边说：‘No! I'm not Japanese, I'm Chinese!’(我不是日本人，我是中国人!)几个老人立即返身，一个老人眨着深眼眶里灰蓝的眼珠，还不甘心地盘问：‘Hong Kong?’(香港?)‘No! 北京!’老人瘪瘪嘴，丧气地放开了我。”

佛罗伦萨到底是佛罗伦萨，它的拉生意也算有点教养的呢。至少这里没有由于买卖不成就啐你一口咒你几句的恼人场面。不过，还应当搞清楚的一点是：一方面是人家不愿一咒，一方面则也许是不屑一咒。一个“立即返身”，说明多少问题！犹如一名高贵的公主，佛罗伦萨很美很可爱，但她却决计不会来爱一个清寒的过路客的。这使我想起一位友人的海外来信，说起在他课余打工的餐馆，洋老板见面时完全合乎礼仪，但那眼神是不屑的。我在回信中，管这叫做“有教养的歧视”。

这种歧视，不必亲历身受，也会刻骨铭心。我最难过的，是在读到杨潇解答同行的日本人柴野夫妇关于“为什么一说是 Chinese，就放了你”的疑问时：“‘因为，’我突然觉得喉头发哽，‘因为中国穷。’天真的夫人立刻掉过头去，对她丈夫说：‘那以后遇到这种事，我们也说 I'm Chinese！’他俩都笑了，我却笑不出来——这个玩笑太残酷了……”

不必责怪人家。不能设想更不能要求所有外国朋友都具备白求恩一样的国际主义胸襟。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人家不穷，人家没有压力，人家就有笑的权利。在这笑声中，一个中国人的感受，只能是十倍的震惊，十倍的清醒。因为，重负在我们的肩头，压力在我们的心头。

一个出席社交聚会的人切忌衣饰寒酸，一个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国度岂可长久清贫。欲使炎黄子孙不仅在淮海路、长安街昂首阔步，而且在纽约曼哈顿、东京银座、佛罗伦萨车站广场都挺起腰板，我们就需要全身心地来实行这句经常提及又经常漠视的口号：“变压力为动力！”就需要齐心协力，千方百计加速完成整个中华民族脱贫致富的现代化建设进程。如果还有什么人在磨磨蹭蹭，像格里希摇头的“一张‘参考’一杯茶，东拉西扯过半天”那种风气，像曾乐叹息的“从国外引进

技术资料，国内同行却彼此封锁”那种做法，如此这般，我们就该点他一下：中国人，你怎么不焦急？人家开玩笑是人家的事，倘若我们开自己的玩笑就会误大事。

曾记否？来自佛罗伦萨的《神曲》鼓舞过“五四”一代中国人。愿今天这一来自佛罗伦萨的玩笑也能令我们每个人由自警而奋进。

(1991年4月26日《文汇报》)

第五个烧饼

总有三十年了吧，还是念小学的时候，听母亲讲过一个笑话。一名憨汉买烧饼充饥，一连吃下四个都没饱，就又吃了一个，这才说：“哎呀，就这个烧饼管用。前四个算白吃了。”听罢，我们兄弟姐妹都哄笑起来。真的，世上哪有这样的傻瓜呢，他也太傻了。

直到今天，我才领悟那笑话决不仅仅是笑话。笑话乃是变换了形态的真话。它不过是将生活中不显眼的荒谬着意放大一下，就像把沾有细菌的玻璃片放在显微镜下那样。

这是事实教育我的结果。上海郊区有一家社办工厂组装的机床，由于齿轮噪音大，销售不出去，遂悬“招贤榜”，以 500 元酬金吁请能人攻关。一位外厂的工程师闻讯前往，花了两个小时修改图纸便解决了问题，取走了酬金。据说，社办厂的领导事后颇难安宁，耳里不时刮来风言风语，说什么“写写画画两小时，不脏不累，就给这许多，也太便宜他了”。

说“不脏不累”，这是事实；说“便宜他了”，就社办厂职工月工资一般皆不出一百元而言，也非无稽之谈。然而，诸葛亮“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于是火烧新野，水淹七军，草船借箭，种种般般，不也是轻松得很？真个是“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

灰飞烟灭”，谁又会对他拿丞相薪俸说三道四呢？老是两眼盯住人家出力的手段，却不重视人家出力的实效；老是认为创造价值就该“又脏又累”，却否认智力创造价值、主意带来金钱……如果这种逻辑成立，那就工程师非得抡大锤不可，诸葛亮非得挥舞青龙偃月刀厮杀三百回合不可。

当我们说智力劳动“不脏不累”时，还只说了事情的一面，另一面——“又苦又累”切不可忽略。没有后者，即没有前者。惟有前四个烧饼垫了底，第五个烧饼才会济事。那憨汉之“憨”，就在于无视这“垫底”的作用，从而也便割断了事物的原因与结果之间的关系。一个饱识之士，或者说，由他发出的任何一个高水平的主意，也需要“垫底”，即钻研学问上的锲而不舍，朝乾夕惕，焚膏继晷。有这样一个故事，从前在欧洲，当一位财主取出纪念册对画家费纳说：“我能请你画个画吗？”费纳拿起铅笔画了一会儿便收住了，递过画去索要一千法郎。财主抱怨道：“只画了五分钟，就收一千法郎，不是太贵了吗？”这位艺术大师回答得妙：“不错，我能五分钟就画完这幅画。可我画画的本事，却是花费了三十年心血的呀！”我以为费纳的要求是理胜辞足的。怎么能以简单劳动的标准来衡量复杂劳动呢？爱迪生表述电灯的原理也许只需要花个把小时，但电灯的发明过程却确确凿凿经过了几百个不眠之夜！

现在每逢听人议论知识分子的报酬，我不觉就想起“第五个烧饼”来。这自然是笑话，但它真是不该一笑了之的。

（1985年第6期《现代作家》）